

对话

西北大学副校长高岭：西部高校还需更多政策支持

■本报记者 陈彬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形成了东部强、中西部相对薄弱的布局,这种布局也对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造成了一定影响。虽然近年来,国家已经将优先发展的目光转移到了西部,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国家战略,对西部高校加大扶持力度。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西北大学副校长高岭表示,从各个方面来看,西部高等教育,尤其是西部地方高等教育还应该得到国家更切实的优先支持与发展。

国内高校已被“过细划分”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西部高等教育在我国整体高等教育布局中,处于何种地位?又面临哪些问题?

高岭:在我国高等教育整体结构组成中,地方高校的比重是相当大的,这也决定了国家如果想真正实现人才强国,就一定要把地方高校的水平做强。应该说,近几年我国对中西部地方高校设立了很多项目,并投入大量经费,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目前来看,这样的投入依然不够,尤其在一些政策方面还存在问题。

比如,通过政策的介入,国内高校的水平类别已经被分得太开。这使得很多时候,地方高校所享受到的政策福利与重点高校有一定差异。以校企合作为例,很多用人单位喜欢与高水平一流大学合作,由于国内已经长期形成了国立学校和地方学校的差异,使地方院校的生存空间不多。

再比如在招生层面,学校要想培养优秀学生,生源素质非常关键,但目前层层选拔、层层考试的方式,把学生分得过于细致,这并不利于地方高校的发展。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现行招生方式对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造成了一定干扰?

高岭: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

在考生成绩并非如此细致地划分为三六九等的时期,总有一些地方高校,尤其是西部地方高校可以招到一些很优秀的学生。而如今,经过成绩的层层划分,层层选拔,几乎所有的优秀生源都被“截留”在部属高校。然而,一所高校要在学术和学生培养中产生互动,就需要某种差异化的学生结构,而目前的招生政策使得同一层次的学生大量集中,缺乏很好的组织架构,从而很难互相配合,形成团队。从这个角度上说,如何



“一所高校要在学术和学生培养中产生互动,就需要某种差异化的学生结构,而目前的招生政策使得同一层次的学生大量集中,缺乏很好的组织架构,从而很难互相配合,形成团队。如何改进还需要我们作更多努力。”

改进政策,引导社会观念,让大家感到高校也是各有特色的,还需要我们作更多努力。

高等教育也须均衡配置资源

《中国科学报》:近几年,国家已经开始对中西部高校在资源配置上进行一定的倾斜,在这方面您觉得成效如何?

高岭:不可否认,这几年西部高校已经开始享受到了国家层面上资源配置的“红利”,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西部高校在这方面的差距依然很大。

以生均经费为例,这些年各地发展迅速,地方财政对地方高校生均经费的投入力度也有所增加。目前陕西省高校的生均经费达到1.2万元,然而这一数字距离一些部委高校的差距依然比较大。因为除了正常拨款外,部委高校还拥有各种重大专项,其经费方面的支持比地方高校高很多。

《中国科学报》:您是否认为国家需要将东西部高校的政策和资源全部统一化?

高岭:部委高校和地方高校的实际情况有比较大的差异,自然不需要把所有政策全部统一化,但至少在一些基本的办学内容方面要适当地公平化。

还是以招生计划为例,以西北大学为代表的高水平地方学校,在国家整体的博士生招生计划中,能够招生的比例较之部属高校要少得多。然而,博士生是创新的主力,在科技创新方面也很容易组成团队,博士生数量的缺乏对学校理想的人才培养体系建构影响很大,这方面就需要政策扶持。

在教育资源方面,之前我们一提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大多想到的是中小学教育,其实高等教育在这方面也存在问题,不同高校能获得的资源也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当然不能千篇一律,各学校要发挥各自优势,争取各种资源。与此同时,国家层面也需要给各高校一个基本的经费保障。

这就好比要解决中学教育中的择校问题,就需要实现中学的普遍标准化建设。虽然这种建设不是把所有中学都建成一个模子,但一些基本条件是普遍满足的,这样才能使得一所中学具备培养合格中学生的能力,高等教育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高校不能只管好自己

《中国科学报》:面对中西部高校依然差异巨大的现状,您认为西部高校需要在发展中注

意哪些问题?

高岭:从自身发展来讲,西部高校,尤其是西部的地方本科院校需要为自己设定合适的定位。这种定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在人才培养上,我们的课程体系该怎么定位?在面向应用还是面向基础方面如何取舍平衡?我们的专业设置如何体现地方院校的独特性和优势?

需要强调的是,立足地方并不代表落后或是低层次。对于地方高校而言,如果不能给地方社会文化发展带来支撑,提供服务,那么高校想要得到周边的支持,其难度是非常大的,这方面地方院校需要准确地把握。

其次,总体而言,高校是科技成果的主要产出者和拥有者。地方高校的科学研究必须面向对地方的社会发展需求,不能脱离当地实际。当然,面向地方并不代表所有的研究都是应用型的。地方高校的研究既可以是应用型的,也可以在应用过程中寻找共性的关键技术、理论和方法,进而转化为基础研究,提升学科水平。但无论哪种研究都一定要面向国家和地方的实际需求。

《中国科学报》:您所提到的观点似乎又涉及到另一个理念,即高校需不需要随大流,与社会完全融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您是如何思考的?

高岭:我倒是觉得这是两个概念,高校一方面要有自己独立的办学理念 and 自主权,才能在某些方面具有创造性;另一方面,我们又得问,高校所有一切的创造意义何在?在我看来,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还需要跟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相融合。

有一种理念认为,高校作为高级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机构,似乎只管好自己就可以了。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不完全对的,至少对大部分高校来讲是不对的。我国的确应该开办几所类似于哈佛、耶鲁一样的纯学术型大学,这样可以将主要精力用于基础性、学术性的人才培养及原创性的科研,但大部分高校恐怕不能这样。事实上,国外大批知名高校也是以应用型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德国、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以及法国工程师教育,而我们却在较多地沿着传统学术型大学道路发展,这种发展方式是否正确,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中国职业教育的挑战与机遇

■本报记者 钟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年初,李克强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是明确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五大任务措施。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近日,全球著名软件公司欧特克软件有限公司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通过软件应用、师资培训等方面的合作,提高中国职业院校的教育质量,促进高职人才培养。事实上,早在2009年,欧特克就已与教育部所属的一些著名高校开展了合作。而此次将合作领域扩展到高职教育,是有着什么样的原因?中国的职业教育面临怎样的发展机遇?《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多年从事市场教育的欧特克亚太区新兴市场教育总监乔治·亚伯拉罕(George Abraham)。

“一般来说,教育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小学和中学,这是提供基础性的教育;第二类是职业教育,要让学生利用这个技能加以实践;再往上是大学教育,主要是基于知识的传播与应用。作为教育,它要提供三方面的内容,学生通过学校的教育能够掌握知识,掌握技能。对于大学来讲,更关注的是基于知识的使用,而职业教育则更多的是实用性的技术、技能。而那些研究机构,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创造出更多新的知识,开发新的应用。”亚伯拉罕说,“职业教育,更多的是要鼓励这些学生掌握实际的技能,去解决现实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亚伯拉罕带领团队与巴西、印度等全球新兴国家的教育机构进行合作,在他看来,新兴的国家在职业教育这个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有很多的相同点:“如果我们到这些国家的政府部门跟他们去交谈的话,听得最多的

挑战,第一点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学生来自不同的背景,很多到职业学校上学的学生,他们的家庭可能都不是特别富裕。第二点是学校的基础设施也不够完备,比如计算机这些设施并不是最新的,在基础设施方面,有的国家情况要好一些,有的则是更差一些。第三个挑战是很多国家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都是二三十年前做出来的,在此之后很少进行过修订、完善,这些是新兴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我们要使我们的教育体系改进,让它现代化,那就意味着必须使政府部门、教育机构,以及像欧特克这样的技术提供方、产业从业者,都要合作、联合起来,才能够真正使职业教育有很大的改观。”

但他同时也指出,在职业教育领域,中国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先,中国每年毕业生的数量非常巨大,那就意味着我们有大量的人才涌向市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提高毕业生的素质、质量,从而使他们所受的院校培训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第二点,中国的优势在于中国政府非常了解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他们非常重视,非常强调去实现职业教育的现代化,这是另外一个有利的优势。第三点,中国学生和印度学生都有这样一个趋势,他们不限于在当地发展,还愿意到别的城市去探索、发展,所以只要我们能够让他们在学校接受良好的、符合市场需求的训练,他们就能够国家层面上参与市场竞争。因此,对中国来讲,在职业教育这个领域还是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此次,欧特克软件有限公司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合作,不仅捐赠正版设计软件,开展专业师资培训,还将推动特色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我们会选择比较有优势的专业,由这些学校的校长推荐优秀的专业老师,共同组成团队,在这里我们会建设一套全新的课程体系。除此之外,我们也会一起提供一套完整的教学平台,老师和学生都会从这个终端上获取学习资源。为我们的行业去培养应用型人才,这是我们在整个合作中最核心的目标。”亚伯拉罕说。

他向记者分享了一个故事。在以前欧特克组织设计大赛的时候,职业学校的学生不太敢参加,他们觉得自己没法跟大学生竞赛,但是如今这一情况已经发生了转变。“在新加坡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职业学校的学生所提交的设计作品比大学生的作品水平更高。”亚伯拉罕说,“只要职业学校的学生掌握了技能,他们也能够创造出一些极佳的作品,他们是能够创造奇迹的。因此,我们对中国的高职教育发展充满信心。”

域外传真

与公众打交道有助于科研吗

■史蒂夫·乔伊

最近与一些刚开始工作的学者聊天时,我一直向他们强调与那些非学术界人士打交道的重要性。其中一个学者说我是在鼓励他们变成名人。当然,这不是我有意去做的事情,但这种回复不能不说是具有代表性的。它反映出这些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者的不易:我真的很得变成媒体的指导老师或取悦儿童的人吗?这真的是我想要提高自己职业前景的需要吗?

有人说,这种学者与公众互动的观点是不公平的。与大众互动的理由不仅仅是为了有助于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还在于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向公众解释自己做了什么。然而,与大众打交道的动机感觉上仍是实际性多于道德性。我们都知道,这是所有研究共同体,包括基金会、大学领导层、新闻官员、政策制定者以及媒体的共同要求。

关于学者与公众互动对于处于职业早期的学者究竟是好是坏,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子问题来讨论。一是公众参与有助于他们的学术工作吗?二是公众参与有助于他们获取科研经费吗?

不可否认,与一个不是专家也不从事学术研究的听众交谈,如果交流得比较好的话,是有可能具有极大价值的。正如公众参与国家协调中心后,指出:“参与就

定义而言是双向的过程,包括互动交流以及倾听,其目标是互有益处。”有效的公众参与并不是说要把成员们放进一间房子,然后开始讨论。

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和你的听众进入对话,你怎么能知道他们究竟有没有理解你呢?更别提使得整件事情进行下去了。对于职业发展来说,这显然是很有意义的:找工作时需要跟用人单位博弈,尤其是在面试的时候,你必须向来自不同背景、经验和兴趣的人阐释你工作的重要性质。

首先,你要确保准确的学术工作是在追寻高质量的研究,这可以通过一些一流的著作和外界资助来证明。在媒体上或者学校以外出现过,对于未达到水准的研究是没有弥补作用的。毕竟,在那些传统听众中,学者是最有可能招博士以及成为学术委员会成员的人。

其次,与公众打交道真的有助于你的职业学术生涯吗?或者说,所获得的收益与所花费的时间相比,值得吗?你需要为团队或者院系有所付出,毕竟他们聘请你,你就应当对得起你的薪水。但是你没有必要一直做同样的事情,必须得有点突破。考虑一下,什么能够使得申请者在求职时脱颖而出?

你需要一个好的总结和计划来与公众打交道。对

于前者来说,如前所述,想证明你的研究陈述是否清楚且吸引人,与公众对话是唯一有效的方式。如果有一个人不理解为什么你的研究中某一种酶或者过世已久的作者为什么重要,你就不能按照已经了解的背景继续写下去。为什么他们不明白呢?你的故事中缺少了什么?什么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对于一个计划而言,仍不清晰的是之前的经验是否真的完全需要,或者说,一个好的计划对于你想要做的事情来说是否真的有效。我的感觉是,这是根据投资者的不同而显著变化的,部分取决于你申请的基金数额。仔细阅读投资者的导言,以及他们在网站上的任一案例。问问你的同事,他们是不是有同样的成功申请基金的经验。换言之,努力找出别人做了什么,取长补短。

回到文中最开始的争论,换个思路思考,具有反讽意味的事情在于,出名可能是对职业帮助中的最后一项。那些时常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媒体宠儿不应该让我们变得选择性“失明”,对于与公众打交道的学者数量而言,这群人的数量是极少的。再说了,真的想要出名的话,有太多比从事学术研究更好的渠道可以选择。

(作者系英国卫报记者,本报记者韩珉编译)

如何让课堂“低头族”抬头

■卢晓云

问过的几所大学校园内基本都覆盖 Wi-Fi 信号,注册后学生、教职工可以免费使用,上网非常方便。除了少数老师明确要求课堂内不准使用手机,iPad 等设备,多数老师对此持开放态度,不设任何限制,他们认为现今的环境要禁止学生在课堂使用手机很不现实。于是我留意了美国学生在课堂使用手机的情况,在所听的几门课中,除了《多媒体新闻采集》,课堂上老师要求学生使用手机等设备外,其他课上学生很少会拿出手机,这让我觉得意外。我跟美国学生交流过这个问题,他们常常反问我:“我花那么多钱来上大学,上课为什么要玩手机?”这是一个观念的巨大差异,我们的学生对学习机会的获得普遍缺乏珍惜感,甚至会觉得是在被迫完成任务,自然会敷衍了事,上课玩手机也没有任何负担。我曾经在课上对玩手机的学生说:“父母辛辛苦苦钱供你们上大学,你们上课却埋头玩手机,对得起他们吗?”结果收效甚微。

让学生改变观念并非易事,要让他们的眼睛离开手机,抬头看黑板,作为老师,我们要做得更多。首先,授课方式需要改变。我们多数的课堂教学,

特别是一些基础理论课,照本宣科满堂灌还是常态,试想如果我们学生,这样的课也难免开小差。国外的经验是借助多媒体手段将理论知识形象化、可视化,除了传统 PPT,现在这方面的软件很多,给学生新鲜的视觉刺激会是一个促使他们抬头的好办法;另外,加强互动内容的设计是个老办法,但很有效,我们的学生不爱提问题,那我们就多问问题。

其次,考核方式的变化。很多学生上课不听,因为他们觉得只要考试前临时抱佛脚就能过关。如果在平时课堂上加大考核力度,随堂测试学习效果,让学生保持持续的压力,可能会让松散的学习状态有所改观。

最后,我们也可以顺应潮流,让手机为我所用。学生做“低头族”,无非是因为手机的丰富资讯和及时沟通的特性,我们可以利用它成为课堂的延伸。比如学生中有众多的微信用户,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微信公众平台,与学生分享课程相关资料,讨论作业、回答问题,建立线下课堂和线上课堂的“O2O”。而且,手机媒体的移动化和轻量化会让这种教学模式比利用传统互联网更加高效和便捷。(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教师)

为中专本科学贯通制叫好

■廖迅

近日,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了“3+4”学制中本专科贯通制,即学生从中专职校起步,经过三年的专业学习后,直接升入本科继续深造,七年后,拿到一个高级技师、技师从业资格,外加一张本科毕业证书。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职业教育新举措,呼应了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打通从中职、专科到本科上升通道”要求。一经多家媒体报道,即被赞为是如同创建“职业教育自贸区”。

笔者以为,上海首推中本专科贯通制的好处多多,具体体现在:首先是打通了传统中职教育最多上升至高职学历这一“断头路”。在以往应试教育的藩篱下,大多数中职生被认定为“中考失利者”,不少中职生在走进中职学校的第一天起就产生了自卑心理。表现再好的学生,最多也就是再读个高职,取得一个大专学历,还想继续往上,似乎就没路可走了。如今完成中本专科教育,还有机会接受更高层次的学历教育,读本科乃至读研究生,都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传统观点认为,职业教育只培养普通技术工人,不培养精英层次的人才,但是按照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经验,现代职业教育必须要培养出至少 10%~20% 的行业精英。所以,未来上海的中职和本科、专业硕士整个学历通道一旦完全打通后,职业教育就有望实现不仅培养普通层次的技术人才,也能培养出精英层次的高技能复合型人才。这样一来,上海的职业教育就可彻底告别低学历时代,而上海中职生的成才之路,也将越走越宽、越走越亮堂。

家长们也不妨盘算一下:孩子读中职学校后可以直升本科,将来毕业后,既有技师证书,又有本科学历文凭。职业技能和学历层次两全,相得益彰。既有真才实学、动手能力、理论知识也不错,社会上哪个用人单位会不欢迎呢?孩子职业发展的前途还用得着犯愁吗?

写到这里,笔者想到,其实近年来,上海早就为中职生的成长成才打通了“中高职衔接”的立交桥,通过“专升本”让一部分学有余力、有意继续深造的高职生升格为本科生。笔者由衷为上海新推出的“3+4”学制中本专科贯通制叫好。相信所有的中职生只要爱读书、爱读书,愿意进一步深造,机会是不会和他们擦肩而过的。沿着“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的成才道路,取得更高的学历也不再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副研究员)